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温州评判/胡方松，方韶毅著，—上海：文汇出版社，2005.5

ISBN7-80676-795-9/D.069

Ⅰ.温... Ⅱ.①胡... ②方... Ⅲ.地区经济-经济发展-研究-温州市 Ⅳ.F127.5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5）第022191 号

温州评判

胡方松 方韶毅 刘旭道/著

责任编辑/张 衍 装帧设计/陈天佑 顾永明

出版发行/文汇出版社（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）

经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/

版次/2005年4月第1版 印次/2005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本/787×1092 1/16 字数270千

印张/11.5 印数/1-10000册

ISBN7-80676-795-9/D.069 定价：25.00元

# 前言

温州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。

温州的是非多多，温州的争论也多多。

温州的改革有名，温州的争论也有名。

温州在中国的改革史上，是一个有独特意义的地方。

温州，一个出经验的地方；

温州，一个出新闻的地方；

温州，一个出模式的地方；

温州，一个出老板的地方；

温州，一个出资本的地方；

温州，一个出财富的地方；

温州，一个出争论的地方；

……

围绕着温州和温州模式，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争论，有的争论已经成为定局，有的还在进行之中，也有可能再发生新的争论。

无论温州的是非如何，“温州”如今成了一个品牌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
无论对温州模式的争论如何，“温州模式”如今已得到生活的承认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
不过，对于温州和温州模式，还有不少被人误解的地方，不少被人忽视的地方，不少被人冷落的地方；也有一些评价往往偏离了温州生活的真实，但以讹传讹，几乎已经变成历史的定论；更重要的是，作为一个宝库，温州和温州模式中还有大量尚待挖掘和发现的宝藏……作为见证温州发展和温州模式风风雨雨的人，有责任根据自己切身的感受，直接的观察，在有关温州和温州模式繁响的评判声中，发一点不同的声音，应该发的声音。

《温州评判》，就是这样一种新鲜的声音，清脆的声音！

CATALOG

# 目录


**第一章　是非温州　　/001**

温州是一面旗帜，一面中国改革的旗帜。

温州又是一面有争论的旗帜，从二十世纪一直争论到二十一世纪。自从温州在改革中出了名，温州也就是非不断，争论不断。

是非的焦点，争论的焦点，不是别的什么，而是温州模式。

**第二章　历史温州　　/025**

温州，曾经是“东南小邹鲁”。

如今，谈温必言商。有人甚至认为温州是文化沙漠。

这是一个被误读的温州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没有千年温州沉淀下来深厚的人文底蕴，就没有今日温州的灿烂和辉煌。

温州，不仅仅是偏居一方的地理名词，更是一种文化、一种精神的观照。

**第三章　风流温州　　/037**

温州是个小地方。

改革开放后，温州名声大振。人们的目光聚焦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。

温州成了中国改革者朝拜的“麦加”。

温州之风光，前所未有。

这是为什么？

**第四章　家族温州　　/055**

在中国这个古老的社会里，家族是棋局里的棋子。这是一盘永远没有结束的棋局。

对于“温州模式”这个从家庭工业里成长起来的经济格局来说，家族更是一个抹不开的话题。

**第五章　九州温州(上)　　/069**

皇城根下、黄浦江边、天山脚下，长白山麓、天涯海角、峰巅谷底……处处都有温州人的身影和难懂的温州话。他们如“野生动物”一般龙腾大海、虎啸山林。在城市人群不屑的眼光中经历了地狱之火的磨炼，以九死而不悔的执着书写了一个由蝌蚪变青蛙的进化方程式。

**第六章　九州温州(下)　　/089**

“开发西部”与“振兴东北”是最让中国上下深含期盼的词汇。其强烈的政策背景又会给根根头发如天线的温州人带来了什么？温州人又能做些什么？

第七章　海外温州　　/113
温州有句俗语：“在温州要说普通话，在国外要说温州话。”
仅此一句，道尽了温州的“国际化”背景——前半句说温州外来人口之多，后半句则说温州人在国外分布之广。
温州市的地方长官引以自豪的一句话是，中国有“两个温州”，指的是除本土之外，约有160万温州人活跃在神州大地。照此类推，世界上便有“三个温州”——还有一个由40万温州游子串成的“海外温州”。

第八章　商会温州　　/131
百年之前，公元1901年，温州商界人士曾建立了温州历史上第一个区域性的商人组织——温州府商会。
百年之后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160万温州人走出温州，不仅创业的足迹遍及全国，而且建立了中国第一批异地新商会，几乎遍布全国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的温州商会。
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创举。
这是一座历史性的丰碑。
中国各地的温州商会，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事物。
中国各地的温州商会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突破。

第九章　有为温州　　/145
“无为而治”。
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温州政府描绘的“角色脸谱”。
从经济学家到社会学家，从新闻媒体到平民百姓，这种调门一时成为“流行”，一时成为“定论”。
言下之意是，温州政府官员是“无所事事”，甚至于“马放南山”，甚至于顺水也无须推舟。
而事实上，无论这言语中包含的是对政府审时度势的褒扬，抑或是对碌碌无为的批评，简洁如斯的“经典”已构成对温州影响最为久远的误读。

第十章　明天温州　　/163
对今天的温州要关心，对明天的温州更要关心。
从生存命题到发展命题，从贫穷落后到基本小康再到全面小康，今天的温州是可以大写一番了。那么明天呢，明天的温州到底会怎样，明天的温州模式到底会怎么样，温州人和非温州人，专家学者和平民百姓，人人都在关心，人人都在议论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# 1 第一章 是非温州

温州是一面旗帜，一面中国改革的旗帜。

温州又是一面有争论的旗帜，从20世纪一直争论到21世纪。自从温州在改革中出了名，温州也就是非不断，争论不断。

是非的焦点，争论的焦点，不是别的什么，而是温州模式。

其实，温州人无意在中国创造一个“模式”，也不想在中国推行什么模式。温州的领导从不自称什么“模式”，更无意叫人仿照什么模式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名词，“温州模式”是理论界人士的一个概括和称呼，是经济学家的一个界定和探索。

最早公开提出“温州模式”这一概念的，是1985年5月12日上海的《解放日报》。这一天，《解放日报》的一版头条位置，刊发了该报记者所写的专稿《乡镇工业看苏南，家庭工业看浙南——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》，并配发了题为《温州的启示》的评论员文章。在专稿和评论员文章中，首次公开提出了“温州模式”。

专稿当时是这样描述“温州模式”的——

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，短短几年，已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。如今，“乡镇工业看苏南，家庭工业看浙南”，已为人们所公认。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，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——“温州模式”。

评论员文章的描述更进了一步——

地处浙南的温州广大乡镇，这几年走出了一条发展经济、治穷致富的新路子，这条路子的独特方式，就是乡村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各种专业市场的兴起。它同乡镇工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，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，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“温州模式”。

自此发端，可以说，温州模式成了中国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课题，也成了广大实际工作者的一个实践课题。根据温州人民的实践和创造，不同层次的领导、专家和学者，都在进行着各自的研究、概括和描述。有人称之为“模式”，也有人称之为“格局”。理论界和新闻界曾先后在温州多次召开全国性的温州模式研讨会，有志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批人士先后到温州考察参观，全国各个省市也几乎都组团到温州作过实地考察，对温州的发展以莫大的支持和鼓励。

尽管有过反复，有过曲折，但温州模式热，却热了整个80年代，热了整个90年代，并一直热到今天。与此同时，争论也一直伴随着“温州模式”，从20世纪



绵绵八百里瓯江承载了温州太多的是非。

争论到21世纪，争论到今天——斥其为“私有化”者有之；攻其为“搞资本主义”者有之；批其为“丢了政权”者有之……温州则因温州模式的争论，时“香”时“臭”，“香”时香飘全国，“臭”时臭气冲天。

面对风风雨雨，温州人有过担心，也有过彷徨，但好在不为所动，即使是面临泰山压顶般的责难，仍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。他们记住了一句话：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，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。他们不断地深化改革，不断地开拓创新，不断地发展提高，富裕自己，完善自己，把温州模式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。

李锐同志对此曾题诗鼓励道：

任人评说短与长，其实异常为正常；

自力自强凭大胆，我行我素握朝纲。

事关经济新模式，情系歌诗旧故乡；

浇灌文明花两朵，盛开并蒂吐芬芳。

温州模式在发展，对温州模式的争论也在持续。

## 说前途，是是非非

先说最新的一次争论。

时间：2003年10月。

地点：上海，确切地说，是上海的新民周刊。

焦点：温州模式是否没有前途了？

这场争论是由温州2003年上半年的几个经济增长数据引起的。

上海的《新民周刊》2003年第23期以“温州滞足待破茧”为题，刊登了一篇文章，对温州的前途发出了疑问——

这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，从未出现过的令人担忧的情况。在浙江省内11个地市主要经济指标的排名中（包括杭州、宁波、温州、嘉兴、湖州、绍兴、金华、衢州、舟山、台州、丽水），一直名列前茅的温州，在2002年年末，排名掉到了全省第七。进入2003年，温州的排名更是每况愈下，上半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排在全省倒数第二，随后的7、8月份，接连两个月排名倒数第一。温州怎么啦？

令人担忧之论当然不错，但一个“滞足”，一个“破茧”，短短的四个字，

则很清楚地说明了文章的倾向。

不知是粗心还是什么，作者在这里说的是不明不准不实。温州200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个亿，这在全省名列第三，怎么是第七呢？即使温州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点也没增长，也不可能排在全省倒数第二，更不可能掉到全省倒数第一。也许作者说的是经济的增长率，那就不是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了。但作者在这里说的也有误——温州的经济增长率，在反私有经济最热闹的九十年代初，曾掉到了几乎是接近零的程度，远比如今低，远比如今令人担忧，而不是“从未出现过”，怎么就记不得呢？为温州经济的发展担一份心事，这是好的；问“温州怎么啦”，则显得有点指手划脚。

如果说这还只是问一个“怎么啦？”，还算颇为客气。那么2003年12月8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“中国经济的转轨与发展：理论与政策”研讨会上，据报道有位教授则干脆预言：现在的“温州模式”将在25年—30年后消失。

这个预言够惊人的！

预言的根据，据称是对“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不同层面进行了细致观察，提炼出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”。那么是哪“三个现象”，有如此巨大的威力，能左右温州模式的生死存亡呢？

据浙江在线新闻报道，这“三个现象”是：

现象之一：近25年来，温州区域经济迅速发展；同时，近10多年来，温州的制造业结构演变极其缓慢，基本局限于低加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，如皮革、服装、打火机等。

现象之二：作为沿海开放14个城市之一，温州的外资引进步伐极其缓慢，温州极少有温州以外的人来创办和经营企业，温州的“外企”基本上是持外国护照的温州人的企业。

现象之三：温州人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从国内到国外满世界闯荡，把温州人的生意撒向世界各地。

也许是我们不是理论家，站不高看不远，怎么也弄不懂从这三个现象，居然能够预言温州模式的消失，而且还能够预言温州模式具体消失的时间？

据报道，之所以能够那么预言，是因为这三大现象引发出三大问题：

其一：温州制造业结构是否存在“代际锁定”？

其二：温州为何没有“外企”？外地人为何不到温州办企业？

其三：温州人为何要通过大规模移民的方式来撒开生意网？

如此“三问”，那就更加令人不明白了。也许是我们不懂温州模式，也许是我们不懂经济理论，这三个问题，即使都是问题，也都是很简单的问题，而不是什么理论深奥的问题，更不是什么天大的问题，会导致温州模式的消失。

对此不能不辩一下。辩得是对是错，那只能让历史来做结论。

先说所谓“大规模移民”，且不在这里讨论“移民”这个词语用得是否准确，如果说是指温州人把生意撒向全国各地世界各地，这本来就是温州模式的题内之义——千军万马，千山万水，千方百计，千辛万苦。改革开放需要流动，市场经济需要流动，经济全球化更需要流动。正因为有了这个大规模的流动，才有了温州模式；没有这个流动，就没有温州模式；这个流动越流得有效，温州模式

也越有活力，怎么会反过来造成其消失呢？

再说“没有外企”的问题。温州有没有外资企业，温州的外资企业是多是少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温州的外资企业少，这只能说明温州的对外开放存在问题。温州模式的发展趋势，这又是一个问题，同外资企业的多少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。因为温州模式不是珠江模式，讲的是依靠民资而不是依靠外资发展经济。看温州模式的发展趋势如何，看的应是民营企业或者说是私营企业，而不是外资企业。如果看外资企业，那就没有温州模式，也不需要温州模式，因为已经有珠江模式了？因此，借外资企业谈温州模式，不知是文不对题，还是故弄玄虚呢？温州当然要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，温州也需要多吸引一些外资，但这是外资上的多与少的问题，而不是温州模式是否消亡的问题。温州不是珠江三角洲，不需要走向珠江模式，也不可能走向珠江模式。如果把温州模式推向珠江模式，那才是温州模式的真正消亡。

至于温州多劳动密集型产业，这又有什么不好？生产皮革、服装等生活消费品，又有什么不好？什么“代际锁定”？似乎温州这一代人是不行了，只能生产生活消费品，不能搞其他的东西，只能等待下一代人了。这难道是对温州模式的科学评论吗？其实，越是劳动密集型，越是可以多安排一些劳动力。越是生活消费品类产品，越是有长久的生命力。无论社会怎么进步，无论科技如何发展，即使是100年1000年后，甚至10000年后，人总是还需要穿衣的，不至于连衣服也不需要吧。何况中国要有科技密集型的经济区，也要有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区。且不说如果遍布中国的都是科技密集型经济区，那么13亿人中的半数劳动力该怎么办，是送到月球上去，还是送到西方发达国家里去？不知那些只唱科技密集型不讲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学家，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？温州当然要发展高科技产业，但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，不是以哪个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，更同温州模式的发展趋势没有关系。

其实，同预言者所说的三大现象引出三大问题相反，如果是科学地辨证地看问题，其所说的三大现象，所引出的不应是三大问题，而是温州模式的三大发展。

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言，更不是什么胡言乱语。

作为现象之一的“劳动密集型产品”，这正揭示了温州模式的巨大作用，而不是温州模式的突出问题。温州经济的优势就是轻工产品，劳动密集型产品。温州市委市政府对温州发展的一个最新定位就是：国际性轻工城。对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品，不仅不能停步，还要大踏步地发展。这种能容纳更多劳动力的产品，这有什么不好？温州如今吸纳的外地劳动力为160万人，全国有几个中小城市能做到这样？中国600多个城市，不要说每个城市都容纳100万人，只要每个城市多容纳10万人，全国就可新增就业岗位6000多万个。这对中国的意义是什么，想必每个关心中国经济的人士都是清楚的。温州为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如果暂时看不到这个意义，那倒没有什么关系；如果否认这个意义，那就成为一个问题了。还应该看到的是，越是劳动密集型企业，越是劳动密集型产品，就越是有比较强的市场竞争力，就越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胜利。在加入WTO后，随着国外市场对我国

产品的更加开放，温州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品，也正在赢得越来越大的国际市场。2001年世界经济不景气，我国的出口额大幅度下降，而温州的出口额却大幅度上升。2002年和2003年，温州的出口也是同样大幅度上升。“不管白猫黑猫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”，不管劳动密集还是科技密集，能够多出口就是好产品。当然，温州也需要科技密集型企业和科技密集型产品，要重视和发展科技密集型企业和科技密集型产品。但重视和发展这一个，决不是不要那一个，更不是否定那一个。温州对这两个产品都需要，中国对这两个产品也都需要。特别重要的是，要沿着温州经济的特色去提升，提升温州现有轻工产品的科技含量，提升温州现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科技水平，而不是不要现有的特色企业和特色产品。

作为现象之二的“温州外资引进缓慢”，这正说明了温州模式的巨大威力，而不是温州模式的软弱无力。应该说，预言者说“温州外资引进缓慢”，这还是客气了。有的人，则干脆提出了个“温州零外资现象”。不管是“零外资”也好，“引进缓慢”也好，反正都是说一个少。温州的外资引进少，这是个事实，谁也不会否认。可温州的外资引进少，并不是今天才少，而是一直都比较少。我们承认这个事实，或者说我们反映这个事实，应该引出一个什么结论呢？如果告诫温州应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，这就对了。如果断言温州模式有问题，那就错了。发展经济无非是靠三种“资”——“国资”、“外资”和“民资”。有外资当然好，有民资也非常好，有哪个“资”就用哪个“资”，不必非强求某一个“资”不可。温州就一直是依靠民资发展起来的，温州模式就是一个典型的民资模式。温州过去主要是依靠民资发展，现在主要是依靠民资发展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也主要是依靠民资发展。温州越是主要地依靠民资发展，温州模式的意义也就更加巨大，温州模式的命运也就更加长远。温州若是变成了主要依靠外资发展，那就变成珠江模式了，温州模式真的要消亡了，还有什么温州模式可言！所以，温州暂时存在的“零外资现象”，更确切地说是“少外资现象”，不仅不能说明温州模式有任何的问题，反而是以无可辩驳的事实——“少外资”的事实，从一个全新的角度，或者说一个全新的视野，揭示了民资的作用不比外资小，甚至比外资更大，也就是温州模式对中国发展的作用比其他的模式更大，完全能够造就一个地方的全面小康经济。中国的每一个城市，每一个地区，如果都能够像温州那样，主要依靠当地的民资发展自己的经济，那么整个中国就可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了，离发达国家的水平恐怕也不会太远了。

作为现象之三的“大规模移民”，更是温州模式的新发展，而不是什么温州模式的消亡。如今在全国各地闯荡的温州人，用“大规模”这个词太抽象了，应该说是“百万大移民”，更准确的说法是“160万人大流动”。谁都知道，专家们更应该知道，流向全国各地的160万温州人，不是160万个民工，而是160万个老板。他们不是去与人争夺饭碗，而是去给人创造饭碗；不是去与人争夺国家资金，而是去实践和传播如何依靠民资发展经济，也就是在传播温州模式。这不只是产品输出，也不只是资金输出，而是老板输出，更是模式输出。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创造，更是温州模式的一个创造。只要看一看全国各地说不尽的“温州村”、“温州城”、“温州街”，以及那些“北方温州、西部温州”等等，就可

以知道这个创造的作用、意义和影响是多大！这160万个温州老板，在全国各地不知再造了多少个新温州！就说万人一个吧，那就有160个。如果这样计算太多的话，那10万人一个总可以吧，那也有16个。即使温州本地的经济都不行了，但在中国各地有了十个百个甚至万个“新温州”，请大家都来评一评吧，这是温州模式的发展还是温州模式的消亡？

其实，说温州模式没有前途，并不是什么新问题。温州模式从诞生到成长，20多年来可以说经过了五个阶段：一是呼唤阶段，从1980年到1985年；二是推广阶段，从1985年到1989年；三是争论阶段，在1989年到1992年；四是正名阶段，从1992年到1997年；五是普及阶段，自1997年以来。在每一个阶段，只要温州经济发展中出现一点问题，只要中国大地上有一点政治风浪，就有人出来预言温州模式没有前途了，巴不得温州模式在明天早晨就寿终正寝才好。无论是物质文明方面的问题，还是精神文明方面的问题，总会有人把其与温州模式的前途挂起钩来。

当年当温州一段时间发生产品假冒问题时，曾发生过温州模式前途的激烈争论。有人曾大声质问：既然温州模式那么好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假、冒、骗？

当年当温州有些地方发生青山白化现象时，曾发生过温州模式前途的激烈争论。有人曾拿此严肃发问：什么温州模式，物质上去了，精神下来了。

当年当温州不少企业仍然坚持家族经营时，也曾发生过温州模式前途的激烈争论。有人对此曾进行了大声疾呼，说什么家庭经营随着经济的发展是越来越没有生命力了，说什么前店后坊是再也没有前途了，说什么老板自己管理企业是再也发展不了，等等。

实践的回答是：这样那样的问题，都在温州的发展过程中解决了。这样那样的责难，也都在温州的发展过程中消失了。

温州的官员，曾为此总结出一个“过程论”——温州经济发展有一个过程，温州模式发展也有一个过程。过程中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，完全用不着奇怪，更不应责难。正确的态度和做法是，正视和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，找出解决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办法，让温州经济的发展前途更好，让温州模式的发展前途更好。

先是怎么看：初始阶段不完善，过程当中很难堪，负面效应总难免，问题在于怎么看，关键在于怎么干。

再是怎么干：坚持正确的，完善不足的，克服负面的，引导扭曲的，改正错误的。

对于种种有关温州模式有无前途的争论，种种有关温州模式要消失的预言，这个过程论，不能不说是一剂甚好的良方。

不独如此。对那个预言的时间，也该说上几句。

先要说上一句，人不是神，现在就预言25年30年的事情，这个是否有点过早了？

自然，早就有人说过温州模式的寿命不长，但那些人都很聪明，从来也没有说寿命到底有多长。如今判决温州模式的寿命只有25年了，预言温州模式在25年后就要消失了，不知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创举，还是一个政治学上的创举？看来有人是想做温州模式的生死判官了。不知这个判决是如何做出的，不多不少，刚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好25年？

温州模式在25年30年后就要消失了？这个话，看起来似乎有点语出惊人，其实却没有什么意思。

作为历史长河来说，25年只是一瞬，够短的了。但对于一个事物来说，25年也不算太短。如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的第一年算起，温州模式至今已有25年的历史，再加一个25年，就有50年的历史了。作为一条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子，即使温州模式届时真的如预言者所说的那样消失，那也不是短命而是够长寿了，不需要什么人可怜，也不需要人感叹。至少，它比我国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其他种种模式，寿命长多了。它对中国改革开放所起的作用，也已经可以了，没有什么可遗憾的。

当然，仅仅这样说是不够的，也不能令人信服。

对于这个温州模式25年后要消失的断言，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。其错不在于25年这个时间是否准确，而是在于温州模式是否要消失。如果温州模式要消失，那么无论是25年消失也好，或者50年消失也好，都是一个样的，不会构成理论上的错误；如果温州模式一时不会消失，却说其不久就要消失，那就是理论上的错误了，即使时间说得更长一些，也不能掩盖其错误。



1983年12月，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，热情地肯定温州苍南县宜山区农民发展家庭工业。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对温州的非公经济的支持性表态。图为万里在1986年4月6日视察瑞安塘下家庭工业。

温州模式的内核是私营经济，温州模式讲的是如何依靠民资发展一个地方的经济。因此，温州模式的前途，或者说温州模式是否消亡，不取决任何别的东西，也不取决于温州经济发展如何，而只取决于我国私营经济的命运，取决于温州私营经济发展的程度。只要国家宪法不做修改，只要私营经济依然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只要私营经济在我国还要继续鼓励不受限制地发展，只要中国多数地方还要依靠以民资为主走向全面小康，那么温州模式就有存在的必要和意义。这不是25年30年的问题，也不是50年100年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历史阶段的问题，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。这也不是一个温州地方的问题，而是整个中国的问题。可以说，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少长，温州模式的寿命就有多少长。这个阶段，总不会只有30年吧。至于在初级阶段以后，温州模式的命运如何，那是将来要由实践决定的问题，现在谁也不好说，谁也说不清。至少，不需要今天的人去空操那个心，去操那个不该由我们来操的心。

作为一个认真研究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严肃学者，还应该看到的是，温州地方经济发展的快与慢，决定的不是温州模式的存在与消亡，而是温州模式的丰富和提高，能给温州模式增添的东西是多一些还是少一些。温州地方经济发展快，那么给温州模式增添的东西就多；温州地方经济发展慢，则给温州模式增添的东西就少。但只要温州经济在发展，那么温州模式也就在发展，在提高。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是波浪式的，任何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也是波浪式的，因而温

州的经济发展也是波浪式的，温州模式的丰富也是波浪式的，总是有发展快丰富多一些的时候，有发展慢丰富少一些的时候，这是很正常的，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我们的主观愿望，当然是希望温州的经济发展年年高速度，温州模式的内容年年有个大丰富，但这是不现实的。凡是科学地研究问题，就不应在温州经济发展快的时候，把温州模式说得什么都是最好的；在温州经济发展缓慢一些的时候，又把温州模式说得什么都不是，甚至说温州模式很快就要消亡了。

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，只要没有特别的情况，增长速度比较缓慢的时候，一般都是经济调整期，其后必然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期。一个国家如此，一个地方也是如此。温州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时期。完全可以相信，不用一年半载，温州的经济发展，又将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期。温州模式，也将更加引人注目。

温州社会的发展前途一定看好。

温州经济的发展前途一定看好。

温州模式的发展前途也一定看好。

当然，温州模式也有自己的寿命，也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，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，完成自己的使命，终结自己的历史。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，更是一个历史的过程。作为一个理论家，没有必要去责难，更没有必要去预言。

## 问姓氏，是是非非

中国多姓氏，中国人也好问姓氏。

温州模式姓什么，也一直有人在问，几乎被人问了一二十年：姓“社”，还是姓“资”？

温州到底是姓什么的？温州模式到底是姓什么的？有人总是拿着这个姓氏不放，似乎不问出个所以，温州模式就不能归宗。

这就不能不说个明白。

温州自从出了个模式，就有人出来问“姓”，使得这个温州的发展不一帆风顺，这个模式的发展也不一帆风顺，曲曲折折，反反复复。因为多方面的原因，特别是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原因，以及温州经济在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，致使温州模式的姓氏长期难产，对温州模式出现了不同声音的争论，甚至还有全盘否定温州模式的。那些对温州模式持有疑义的，或者对温州模式加以否定的，有理论界的，有新闻界的，有政治界的；有在台下的，有在台上的，有在高层的；有评论几句的，有一家之言的，有以权作理的。这就使对温州模式的争论，不仅是颇为激烈的，而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；不仅牵涉到经济发展之路，而且富有浓厚的政治色彩，甚至上升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。

这个姓氏之问好厉害。这场围绕着温州模式姓氏的激烈争论，前后长达十年左右，从1985年到1995年，跨度了两个年代。它对温州模式的发展，施加了或多或少的影响，带来风风雨雨的环境，造成了曲曲折折的历程。此后也还有一些小争论，但那已无关大局。今后也可能还会出现新的争论，但那也不用担心。对于

温州模式来说，作为一种经济现象，作为一个历史过程，出现不同声音的争论是正常的，有一些否定意见也不可怕。温州模式欢迎争论，温州人不怕争论；温州模式不怕否定，温州人也不怕否定。温州人民相信发展是硬道理，你说你的，我干我的，你争你的，我做我的，只做不说，多做少说。在一片争论声中，在一场高压声中，坚持发展不动摇，坚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不动摇，坚持发展私人经济不动摇，用经济发展了的事实来回答争论，到底什么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。

其实，对于温州模式来说，有争论是好事而不是坏事，有争论远比没争论好得多，越是有争论，争论越是激烈，就越能扩大和增强温州模式的影响；越是有争论，争论越是激烈，就越能促使和推进温州模式的发展；越是有争论，争论越是激烈，就越能压迫和督促温州模式的完善提高；越是有争论，争论越是激烈，就越能显示和开阔温州模式的意义。当然，对温州模式的长期争论，对温州模式的一时否定，对温州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，不仅拖延和压制了温州经济本来可能更快更大的发展，也造成了对一批改革之士的历史不公。这是改革的代价，也是曲折的代价，更是历史的代价。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代价，不忘这个代价，牢记这个代价。不看到这个代价，忘记了这个代价，那就是对温州模式曲折发展历程的一个背叛。

姓“社”还是姓“资”，这个争论的最主要问题，争论时间最长的问题，也是影响最大的问题。那些否定温州模式的人，更是在温州模式的姓社姓资问题上纠缠不休，并想以此一棍子打死温州模式，打死肯定和支持温州模式的人。

肯定和支持者说，温州模式理所当然是社会主义的，理由很简单也很有力：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，就要承认人民群众自己也是经济的发展者。温州老百姓自己起来发展经济，自己解决吃饭问题，自己解决富裕问题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

否定者也振振有词：共产党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改造私营企业，发展私人经济能算哪一家社会主义？说的话可能不一定那么直截了当，但那个意思是十分清楚的，谁看了都明白的。

这个争论是相当激烈的，争论双方的观点都很鲜明，持续的时间也相当长，对温州造成的影响也最严重。

有外地人说温州是姓资的，

也有温州人说温州是姓资的；

有官员说温州是姓资的，

也有学者说温州是姓资的；

有下层人士说温州是姓资的，

也有高层人士说温州是姓资的；

有理论界说温州是姓资的，

也有政治界说温州是姓资的；

有国内媒体说温州是姓资的，

也有海外媒体说温州是姓资的；

有“左派”说温州是姓资的，

也有“右派”说温州是姓资的。

颇为有戏剧意味似的，美国人也参与了这场争论。不过美国人比我们干脆，就直截了当地说温州是资本主义的。1987年，美国《新闻周刊》就曾以《沿着资本主义道路》为题，对温州做了介绍。在90年代，当温州市长出访美国时，也曾被美国媒体称为“中国资本主义的市长”。这么一来，温州就更加糟糕了——连美国人都说你是“资本主义”，你还不是资本主义是什么？

这场争论决不只限于理论界，也不只限于新闻界，在报纸上登篇文章，在杂志上发表论文，在讨论会上讲几个观点，别人同意不同意，都没有什么关系。最为严重的是，把政治界也卷进来了，把高层人士也卷进来了。

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《交锋》一书，其中有专门的“温州再遭大批判”一节，介绍当时温州模式所遭遇的情况，围绕着温州模式姓社姓资的斗争情况。

作者在书中写道：

90年代开始的时候，到这个“麦加”来的“朝圣者”就少了，调查组却多了。两年当中，北京那边就来了4个调查组，说是“取证”，因为不断有揭发温州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材料上呈中央。其中有一件说，温州是“赌博到处有，妓女满街走，流氓打警察，共产党员信菩萨”。调查组之“取证”，显然是要取资本主义复辟之“证”。也许还可以从这里打开一个突破口，来证明“资产阶级自由化”已不独在知识界中泛滥，还侵入了经济的肌体中。

仅此当然还不能说明什么。上面到下面调查，揭发什么查什么，这也是很自然的，关键是看调查的结论。问题在于，

作者在书中继续写道——

这一年夏季，温州一位干部写信致《人民日报》社，揭发温州的私营老板如何耀武扬威，以及雇工们如何的毫无保障，并且还列举不少事实来证明他的揭发不是虚妄之辞。一位领导看到此件，异常震怒。他说，这是严重丧失革命政权，目无法纪，理当查处，不然将大乱。

调查组重返温州，重新调查温州的姓“社”还是姓“资”的问题。报告说，温州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实际比重，比统计数据明显偏高。报告虽然还是承认个体和私营经济对当地经济有好的作用，但还是以主要的篇幅描述了其中的“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”，由此也就部分地改变了“温州经济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目标”的结论。

这就把高层卷进来了，把温州模式的争论高度政治化了。作为一个学术上的争论，作为一个科学上的争论，对温州模式有不同的观点，有不同的看法，那是正常的，也是需要的。

然而一旦政治化，进入了方向道路之争，那就不正常了，问题也就严重了。

那个批示和那个调查结论，对温州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，对赞成支持温州模式的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，对温州模式的探索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压力。

姓社与姓资的争论，由此也进入了白热化。

有一些“左先生”，巴不得把温州打入太平洋海沟，那个调子高得不能再高。

一个典型的说法是：要从“反和平演变”的高度来看温州的问题。

一个典型的做法是：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清理温州过去的东西。

如果仅仅是说说而已，那还好办。不幸的是，还有人要做，似乎温州真的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天下，真的不割这个可怕的毒瘤不可了。

温州人抬不起头来。

温州官员抬不起头来。

温州私营老板抬不起头来。

温州模式的支持者抬不起头来。

坚持温州工作的官员，坚持温州是姓社的，压力极大——这到底是怎么啦？有感到迷惑的，有感到气愤的，有感到无奈的，有感到委屈的，有感到不平的，有感到不懂的，不能不暂时沉默，不能不暂时看看风向，甚至不能不暂时说一点应付的话。

温州的老百姓则不明白，江青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诬指温州是资本主义，怎么这些人到了80年代90年代也说温州是资本主义？到底是温州走错了方向，还是这些人批错了方向？或者，是这些人接错了衣钵？

否认温州是姓社者活力极大。在他们看来，温州姓资，如今是铁板上钉钉，铁定了。那些左先生们无不兴高采烈，得意忘形：早就说过了，温州搞的那一套，就是资本主义。你看，如今怎么样？

至于温州的官员与百姓，则处在激烈争论的旋涡之中，既深感压力极大，又不能不做工作。他们唯一能采取的对策是：多做少说，少做不说，只做不说，不做不说，你争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你说我姓社我也做，你说我姓资我也做，不做老百姓就没有饭吃，大不了少做一些而已。

至于对温州经济发展的影响，那则是灾难性的。在那两年，温州的大批私营老板，或者在等待观望，或者是出国投资，或者是借顶帽子，或者是关门大吉。尽管社会在通货膨胀，温州的经济增长率却几乎是一个零。不知道那些“左先生”，在那里高发议论，高叫温州是资本主义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老百姓的吃饭问题、穿衣问题、住房问题？有没有想过中国是富起来好，还是没有钱照样穷好？有没有想过其口袋里的工资是谁给的，自己又是谁养活的？“四人帮们”有过一句名言，叫做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。如果说左先生们的理论同“四人帮”一脉相通，不知是冤枉贬低了他们，还是抬高了他们？

老百姓则不管什么姓“资”姓“社”，在温州姓“资”之声甚嚣尘上的时候，他们用一句话就说清了问题：如果温州变成了“姓资”，那么中共温州市委干什么去了？中共浙江省委又干什么去了？如果省委市委还是共产党，那么温州的天下就是共产党的天下。

到底是时代不同了。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，也仍然有支持温州的声音，甚至强有力的声音。

影响甚大的，是《人民日报》的一篇报道。该报记者在一篇访问温州的见闻里，对温州的股份合作制大加赞扬，说是“群众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的创造”。尽管文章没有说到温州的私营经济，没有说到温州模式，但在一片对温州的责难声中，能对温州说上几句好话，能肯定温州的股份合作制，那也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


社会学家费孝通是名气最大的“温州迷”。他曾三访温州，写下了《小商品大市场》、《家底实创新业》、《筑码头闯天下》三篇著名的文章。

作用最大的，是李瑞环在视察温州之后的一通讲话。

他要温州官员：“从现实出发，不要怕人家议论”。

他给温州的官员积极减压：“温州这件事究竟怎么看，将来怎么样，都还可以再研究，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。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‘白帽子’，你给自己急着戴‘红帽子’。我说你们先不要戴帽子，脱个光头，不是更凉快吗？”

他还对当地的官员说：“在对待温州这个议题上怎么办，事实上不管你叫不叫‘模式’，已成了我们国家对待个体经济的一种态度。对个体什么态度，人家就看你对温州怎么样……这谁也没有说，不是谁封的，文件上也没有说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”

到了1992年，邓小平同志一番南巡谈话，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把正了方向，也给温州的姓“社”姓“资”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。尽管在句号之后，有的人还会再做这样那样的文章，但大的句号已经画上了，温州人再也不怕那个姓“社”姓“资”的争论了。

温州人是不再怕了，可是有人仍然还要问一问。这个问，当然没有那么直截了当了。

不过，对温州模式姓资的责难，并没有完全消失。

有过所谓“公私比例”问题。代表性的说法是：比例不大是姓“社”，比例大了难道也还姓“社”吗？

有过所谓“补充主体”问题。代表性的说法是：“补充补充”是姓“社”，变成了“主体”难道也还姓“社”吗？

如此等等。

然而这些非难，已经形不成大气候了。因为在理论上，在政治上，在法律上，对此都逐步做出了明确的回答——对一个地方来说，公私比例不再是一个问题，私营经济的比重再大也是社会主义；补充主体也不是一个问题，私营经济唱主角也是社会主义。

温州经济进入社会主义正册了，温州模式也进入社会主义正册了。

温州不是给中国社会主义抹黑，而是给中国社会主义生辉。

党和国家领导人，一个接一个到温州进行考察。

党和国家领导人，一个接一个对温州给予公开的高度评价。

江泽民同志说：全世界都知道温州人会做生意。温州人用上海话来讲是“一只鼎”，用北京话来讲是“倍儿棒”。

朱镕基同志说：弘扬温州人艰苦创业的精神，是我们应对WTO的良策。

1998年3月9日上午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参加浙江代表团审议政府报告时说，我只讲一个观点，温州的经验值得重视，很值得总结。温州的路走得不平坦，曲曲折折，但一直发展得比较好。我在1986年到过温州，作过一次讲话，回来后也写过一篇文章。后来又第二次到温州。我觉得温州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，对我国中西部地区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。我的观点，要重视温州，总结温州经验，在中西部地区推广。温州有很多华侨。温州经验值得研究，要大力推广。

最为令人感动的是，1998年12月，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，田纪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